

叶 晓 军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中國 都城發展史



中国都城发展史

叶 骅 军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都城发展史

、叶 骁 军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建总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4插页 233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 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224-00252-6/K·42

定 价：3.30元

目 录

前 言	(1)
总 论 中国都城的规制	(4)
第一章 萌芽时期的都城 (夏以前)	(23)
第二章 雏形时期的都城 (夏—战国)	(26)
第一节 雏形时期都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26)
第二节 扑朔迷离的“夏都”	(27)
第三节 迁徙不定的商都	(33)
第四节 周都岐邑和丰镐	(46)
第五节 洛水河畔寻周都	(52)
第六节 雨后春笋般的春秋都城和各自雄霸一方的 战国都城	(61)
第三章 发展时期的都城 (秦汉—隋唐)	(77)
第一节 发展时期都城的特点	(77)
第二节 秦都的逐步东移和横跨渭水两岸的咸阳	(78)
第三节 鸿篇巨制的斗城长安	(91)
第四节 铜墙铁壁的东汉雒阳和魏晋洛阳	(118)
第五节 宫室北移的先声——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 齐邺南城	(128)
第六节 群星拱月的建康	(132)
第七节 伽蓝林立的北魏洛阳 (洛京)	(144)
第八节 棋盘之城——隋唐长安与洛阳	(153)

第四章 成熟时期的都城（北宋—明清）	(184)
第一节 成熟时期都城的特点	(184)
第二节 繁华竞逐的北宋开封	(186)
第三节 钱塘形胜——南宋“行在”临安	(201)
第四节 开封的翻版——金中都大兴府城	(214)
第五节 汗八里——元大都	(219)
第六节 明代的中都和两京	(233)
第七节 清北京的三山五园	(264)
第八节 太平天国的天京	(271)
第五章 关于边疆民族政权的都城	(286)
第一节 茫茫大漠寻古都	(286)
第二节 边陲城制仿中原	(290)
第三节 兴王之地作陪都	(295)
第四节 关于西北民族政权的都城	(297)
第六章 辛亥革命以后的都城	(303)
附 录	
(一) 中国历代都城一览表	(309)
(二)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23)
(三) 古都景名	(329)
关中八景	(329)
洛阳八景	(329)
开封八景	(329)
西湖十景	(329)
燕京八景	(329)
金陵四十八景	(329)
后 记	(331)

前 言

中国都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举，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中国都城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水经注》中记载的历代列国故都就约有一百八十处之多。加上北魏以后的历代都城，总数约在二百以上，这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的。

在国内，对中国各个都城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比较活跃。近几年来，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但对中国都城的综合研究，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研究中国都城的发展规律，做得还很不够。如历代国都位置的选择，城市布局和宫殿布局的规律等，只有一些杂志零星发表了一些文章。清初顾炎武、清末梁启超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同我们伟大的都城相比，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就很不够。

日本比较重视对中国都城的研究。日本所出《都城》、《日本的官都》两书，把中国都城和日本都城逐一对比，研究中国都城的发展规律和对日本都城的影响；所出《汉长安城与阡陌、县乡亭里制度》一书，更是规模空前，为我们国内所不及。1982年5月，日本方面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有关专家赴日，参加日本第六次古代史讨论会，主题是古代都城，由中日双方专家主讲。

美国方面，我们了解情况很少。已经知道出版了不少专著，如斯坦福大学施坚雅主编的《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又

译《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收有研究中国城市的论文十六篇。

研究都城史,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城?城,当然是我们看到的城垣。但它的内在含义如何?苏联莫斯科大学考古学系主任A·B·阿尔茨霍夫斯基曾说:“对设防的居址,考古学上采用的术语是‘古城’,对不设防的居址,如果它们与古城同时代,则用‘古村’⁽¹⁾。”这个定义不很严密,因为设防不一定都用城垣。

《古今注》上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又说:“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从这里我们看到,城的出现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²⁾”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告诉我们,城的出现是氏族制度瓦解、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奴隶社会的标志。

最早的城垣出现在什么时候?我国没有发现仰韶文化时代的城址。但在国外,如巴基斯坦的耶利哥城,是公元前七千年的;埃及发现了距今八千年前的古城。二十年代,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第一座城垣。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安阳后岗、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淮阳平粮台,陆续发现一些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垣。有人认为,有些城,如王城岗,也许就是夏都阳城。

但是,以上所说的这些城都是古代的军事、政治城堡,范围很小,城内居民可能都是王室贵族,不能同现代已形成大城市的都城相比。“城市”的概念比城的内涵深,“城”的外延却比城市大。城市包括在“城”之中,而“城”却不一定是城市。中国城市的形成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而城的起源却早得

多。关于城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其一是防御说。城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起来的。

其二是集市说。交换的出现，集市贸易的经常化，于是在交换地点出现城垣等建筑。

其三是地利说。水陆交通的路口，居民的密集，到一定的时候，建筑城垣。

还有人说，最初的居民点建设在河川附近，为了防洪水而修建了城垣。上述诸说都不无道理。但从根本上说，乃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有了私有财产，有了政权机构，才可能修筑城垣。

本书主要论述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都城（包括一些陪都和秦以前的诸侯列国都城）的择都经过，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以及城市布局，经济与文化概况，城市的毁灭与遗址现状。对于都城所在地整个城市的发展和沿革，我们一般不涉及。

在方法上，按照我国都城发展史的分期进行论述，而不是对各个现存所谓古都进行介绍，对于历史上为时很短的一些都城，不作介绍。

我们试图通过以上论述探索中国都城的发展规律。

（1）A·B·阿尔茨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原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4年版，楼宇栋等译，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2页。

总论 中国都城的規制

中国都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过各种名称。称京，称都，称国，称邑，称京师、京辇、京城、京华，又称京阙、京畿、国都等等。《诗·大雅·公刘》中有“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京师”之名始于此。其后“京师”用于都城的称呼，从东周至于民国初年，沿用最久。

《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邑，犹俚，聚会之称也。”《左传》：“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甲骨文中，京字为一高台上的房屋（𡩂，𡩃）⁽¹⁾，且高台有方有圆。《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又说：“卓绝高大为丘，而人力为作之者名京。”⁽²⁾《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师。”《公羊传》更加明确地解释说：“京师者何？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由此看来，对于“京师”之义，为天子所居，高大入众，解释是一致的。可是，到了清朝，顾炎武别立一说：“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周文武建都于此，统名之曰京师。”⁽³⁾此说能否成立，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儿的“国”，即指楚都“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上田正昭先生在其所主编的《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都城》一书中，曾具体地解剖过汉语的“国”字。认为：“‘國’字就是以‘戈’，亦即武器，守卫

| 定的土地‘口’，它围绕以城墙‘口’，总之，是表示都城的意思。”⁽⁴⁾在周代早期的铭文中，这个“戈”是在城墙外面的，城墙里面只有个“口”字（阼）。到周代中期，这个“戈”也包在城内了（國）⁽⁵⁾。

至于都城的其它一些名称，或为代称，或为引申而来。皇帝之车称辇，故都城亦称京辇；宫城前有双阙，都城因之称京阙；都城人文荟萃，故称京华。《国语》韦昭注：“方千里曰畿”；《诗·毛传》认为畿是门内；《说文解字》段注也认为：“畿，门限也”，京畿之称，指京城及其附近地区。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历史，根据城垣形制、城市布局和功能几方面考察，从远古至明清，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二里头文化以前，可称为“萌芽期”；从二里头文化至战国时期，是“雏形期”；秦汉至隋唐是“发展期”；宋、元、明、清是“成熟期”，至于辛亥革命以后，本书只作简略的介绍。

在萌芽期，都城宫室只有古文献记载的远古传说，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个别所谓远古“都城”，实地调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亦未有定论。

南宋郑樵对早期都城作过探索。他在《通志·总序》中说：“都邑之本，金汤之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于是他“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乃作《都邑略》。在《都邑略》中，郑樵载录三皇之都：“伏羲都陈，神农都鲁，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又迁逐鹿。”五帝之都：“少昊都穷桑，颛帝都高阳，帝喾都亳，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舜始封于虞，即帝位都蒲坂。”⁽⁶⁾

《周易》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

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⁷⁾”《孟子》一书，亦有关于尧舜宫室和朝见的记载：“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⁸⁾”“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⁹⁾”

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考证：“尧舜禹之都，相去不过二百里，皆在冀州之内。⁽¹⁰⁾”

上述文献中关于古代传说的记载，可以推定当时已有城廓宫室，有朝见制度，或者说，有了国家政权的萌芽。

这一时期都城宫室是什么样子，无从确切知道。从某些文献记载（如《世本作篇》载“舜作陶”），可推测大概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向有阶级的国家过渡的时期。有关民族史的一些材料，使我们对于朦胧的宫室制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如：

“女真之初无城廓。国主常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国主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宫而已。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锁，则与臣下坐炕，后妃躬侍饮食。⁽¹¹⁾”

又说：“国初无城廓，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解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踏自前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每孟春击土牛，女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于殿侧。民有讼未决者，邀驾以诉，至熙宗始有内廷之禁。⁽¹²⁾”

这两段文字，极其生动明确地叙述了宫室城廓建始之初的发展过程。

在雏形期的初期，都城布局和构成还看不出一定的规律。

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宫室布局已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总的看来，都城宫室还是处于初期阶段，同以后金碧辉煌、规制严整的宫室相比，它只是一个“雏形”。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室遗址，是迄今所发掘的最早的宫室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夏文化或部分夏文化。夏代宫室的发现，证明《世本·作篇》关于“鲧作城廓”、“禹作宫室”的记载是可靠的。当然，二里头文化遗址未发现城垣。夏代城垣实例尚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二里头宫殿遗址略呈长方形⁽¹³⁾，是一个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的夯土台基。台基东西约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方向基本上坐北朝南，夯土层最厚的地方达3米。台基上的建筑群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所组成，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基本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律，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基座高出周围台基面，东西36米，南北25米。从周围柱洞的排列，可以看出这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开间的建筑。殿堂的屋顶，是四坡出檐式。宫殿四周，是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宫殿大门在正南，为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

商代都城，迁徙不定。史载至成汤已八迁，至盘庚又已五迁。目前，可以明确断定的商都遗址仅有安阳殷墟⁽¹⁴⁾。另外，在湖北黄陂发现一座商代某方国的都城——盘龙城⁽¹⁵⁾。郑州商城周6960米，近似正方形，城墙夯土版筑，宫殿遗址位于城内东北角，有人认为该城距今3500年，可能是成汤的亳都。但对它的断代有不同看法，我们暂按商都对待。殷墟未发现城墙，只在西南方向发现一条濠沟。宫殿遗址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如果把陵墓区除外来看）。盘龙城虽仅周一公里多，宫殿区亦位

于城的东北部。

《史记》叙述古公亶父率周人迁于周原以后，“乃贬戎狄之俗，而营城廓室屋，而邑别居之⁽¹⁶⁾”。但周原至今只发现宫室遗址，而未见城垣遗址。位于泮河两岸的西周泮镐两京，确切位置至今不能确定。西周洛邑王城由于东周王城利用原址修筑，已不易辨认。西周成周城的位置，学术界意见不一。

春秋时代，国无论大小，普遍修筑城垣，真如“雨后春笋”。这些古城的形制，往往是大小两城相依。小城是宫殿区，大城是各级官吏和一般平民的居住区。到战国时期，出现了高台建筑，宫殿建筑在巨大的夯土台基上。战国都城还出现了集中的工商业区——市。

洛阳东周王城，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邯郸赵故城，新郑郑韩故城，晋国侯马（牛村、平望）古城，河北易县燕下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都城。不过，燕下都形制与其他都城有所不同。它分为东西两城，宫殿、手工业区及居民区主要集中在东城，西郭城北垣外还有巨大的宫殿台基“老姆台”。东西两城间有水道隔开⁽¹⁷⁾。

春秋以前的都城，自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中心。城市布局、设施，主要为统治阶级的官僚机构服务。从战国时期开始，都城的经济作用开始增长，集中的工商业区——市的出现，是很好的说明。诚然，古代的城市，还不能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比。古代城市居民中，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个现象，大概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从秦统一中国，奠都咸阳，到隋唐长安、洛阳的建成，中国都城进入急剧发展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发展期”。

“秦每破诸侯，彻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

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18）”

“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南至户、杜，东至河，西至泾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连属。（19）”

后来修建的朝宫阿房，规模空前。朝宫周围，离宫别馆，遍布渭南。汉都长安即是在秦离宫别馆的基础上修建的。汉长安城垣形制曲折，城内主要宫殿及市的安排，符合《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规制。

魏晋隋唐时期的都城，如汉魏洛阳⁽²⁰⁾，邺都南北城⁽²¹⁾，南朝建康城，隋唐长安城⁽²²⁾，城垣一律方整。在城门之数，礼制建筑方面，仍然附会《周礼·考工记》。汉长安、唐长安都是十二城门，且每边三门。但宫殿区的位置却一反“面朝后市”的传统规则，移置于都城的北偏，而把工商业区——市，移到南侧。

到成熟期的宋、元、明、清⁽²³⁾时代的都城，多数规制方整，布局严谨。这一时期，除个别例外，又将宫殿区置于都城的中心偏南。汉唐以来的封闭式里坊演变为开放式的街道。商店沿街开设，都城的经济作用更加重要。上述分期，是从都城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划分的。近来，一些研究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分期法。如：谭其骧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中，分为中原期和东移近海期。

中原期：殷（邺）、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原地区，
所以叫中原期。

东移近海期：杭州、南京、北京，在前期四大首都之东，
距海不远，所以叫东移近海期。

刘武君先生在《城市问题》（1983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历代都址变迁与经济重心转移》一文中，分为四个时期。

关中时期 丰镐、咸阳、长安

关东时期 洛阳、开封

北方时期 北京

南方时期 南京和南京作为陪都的时期

这两种分期法实际上是一样的，后者分得更详细一些。关中、关东期就是中原期，北方、南方期就是东移近海期。

在探讨了中国都城历史的分期问题之后，我们再探讨一下有关都城位置的选择问题。

关于国都位置的选择，有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诸方面的因素。

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Cornish)在《大国都》（《Great Capitals》）一书中曾经提出建都三条件：

1. 叉路口。意指交通便利之地；
2. 谷仓。意指都城附近地区粮食以及其它物资供应能满足都城平时和战时的需要；
3. 要塞。意指交通地理形势好，便于防守，以利安全。

谭其骧先生认为历代统治者主要是从经济、军事、地理位置几方面来考虑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有便捷的交通线，便于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但并不完全要求是地理上的几何中心，只要是通达全国的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便于统治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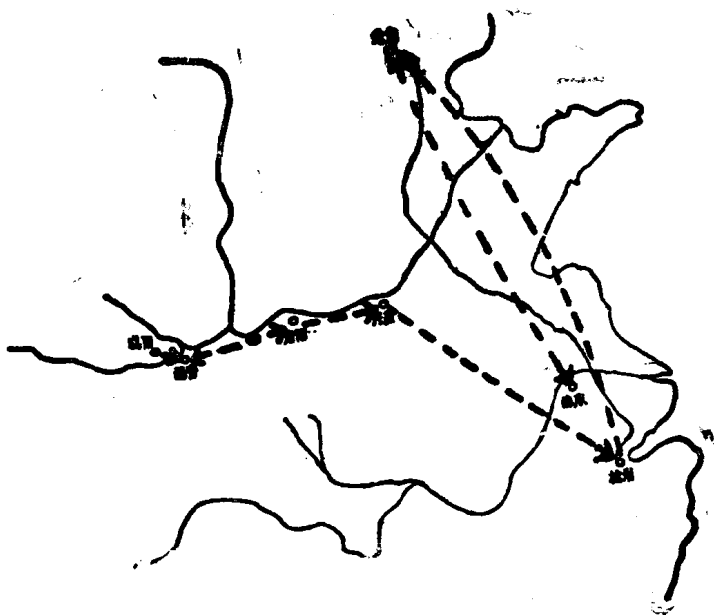
行。

但是，各个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符合理想的首都，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所以每个王朝首都的选择，总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历代首都的迁移，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殷商以来，黄河中下游两岸的所谓中原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接近于王朝版图的中心。掌握了这一片地区，就掌握了全国。这就是从殷周至于隋唐，长达两千二百余年，国都始终离不开中原地区的原因。

魏晋时期，东晋南渡，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至隋唐时，南方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唐玄宗时，北运漕粮已达每年四百万石。五代至北宋二百年间，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南重北轻的局面已经形成。但中原还可以通过水运（当时是最经济最方便的运输手段）通向四方，国都东移至开封，是水运的枢纽之地。宋室南渡，南北分裂，运河淤废，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哪一方面看，中原都已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近八百年来，首都再也不能迁回中原地区。

自北宋以后，我国都城位置的变化，主要变成南北迁移，金人占领了北方，南宋迁到杭州（当时称临安）。元代统治者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主要从政治军事上着眼，当然不愿离本民族的根据地太远，定都北京（即元大都）。但从都城位置与经济重心的关系上看，元大都的选址，无疑是个错误。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应天府），反映了全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在军事上，也有其弱点。主敌在漠北，在交通条件尚差



图一 中国历代都址变迁轨迹图

的时代，距离太远，因此重兵驻北平，造成以后成祖夺权，王室北迁，但定南京为留都，以为补充。清代情况同元代相似，仍定都北京。

明清中叶以后，东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很快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正是考虑到这个趋势，在民国初年主张定都南京。定都南京，除了南京历来是南方中枢，还可以依靠南方强大的经济势力，并便于同国外的交流和来往。孙中山先生还考虑到北京是八百年封建势力的中心，而南京受近代国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